

#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笔谈)

**编者按:** 在 20 世纪近百年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伴随着西风东渐,国际交流活跃,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是本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专题讨论的第三组笔谈,继续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这一历时性角度,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中国史学上的地理观念,天命思想的变化特点,正统论的文化功能,历史发展的“事”、“理”、“势”等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期望能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和总结有所推动,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贡献智慧。

**关键词:**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天命观;正统论;地理思想;历史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 K03 K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08)04—0203—12

## 中国史学上地理观念的滥觞

瞿 林 东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 一、《禹贡》“九州”说

中国先民较早的地理观念,有《尚书·禹贡》所记的“九州”说,有邹衍的“大九州”说,有《山海经》的“五方之山”、“八方之海”说。这三种文献按其年代,《尚书·禹贡》在先,《山海经》当晚于邹衍所论,它们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禹贡》起首写道: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① 《周礼·职方》所记,有幽州、并州而无徐州、梁州。《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所记,有幽州而无梁州。《尔雅·释地》所记,有幽州、营州而无青州、梁州。《汉书·地理志》认同《周礼·职方》所记,并以其为周制。以上,反映了“九州”说在战国、秦汉间的演变过程。

收稿日期: 2008—04—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之一(01JAZJD770005)

作者简介: 瞿林东(1937—),男,安徽肥东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

大禹把全国区分为九州,又依据山势疏通河道,并按照土壤的不同情况制定贡赋。大禹为了区分九州的“疆界”,便在经过的山上插上木桩作为标记,同时对高山大河予以命名<sup>[1]</sup>。

禹是传说中的人物,说他划分了九州并制定了各地贡赋的标准,自不可信。《禹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理著作,根据多年来的考订,它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禹贡》提出的“九州”的地理观念,当是战国时人的地理观念的反映。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九州”说,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萌芽或当早于《禹贡》写完的战国时期。

《禹贡》所列举的“九州”,依次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禹贡》认为,这是上古时期的行政区划。这一说法,颇为战国及秦汉间的一些论著所认可,只是在“九州”的名目上略有不同罢了。<sup>①</sup>但由此可见“九州”之说在战国、秦汉间的影响甚大,可以认为是当时人们的基本地理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禹贡》的“九州”说,并不仅仅是列举一些地理条件名称而已,它所反映出来的地理观念包含有具体的内容,并在记述上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如其记冀

州, 写道:

冀州: 既载壶口, 治梁及岐。既修太原, 至于岳阳; 覃怀底绩, 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 厥赋惟上上错, 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 大陆既作。岛夷皮服, 夹右碣石入于河。

从以上记载来看, 它依次说到冀州的四至、土壤质量、贡赋等级和交通状况, 其中涉及许多地名和有关制度。又如其记荆州, 写道: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 阳鸟攸居。三江既入, 震泽底定。筱簍既敷, 厥草惟夭, 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 厥赋下上, 上错。厥贡惟金三品, 瑶、琨、篚、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 厥包桔柚, 锡贡。沿于江、海, 达于淮、泗。

关于荆州的表述, 除了讲到它的四至、土壤品质、贡赋等级和交通状况等以外, 还讲到了它的物产和民族。《禹贡》所记各州情况, 大抵如此, 不一一列举。由此可以看出, 《禹贡》的地理观念包含这样几个要点: 国家的整体范围、国家的行政区划、各地区(州)的范围及其山川、土壤、物产、民族、贡赋、交通等, 虽记述简略, 但包含的方面却很广泛, 反映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密切关系。

《禹贡》的思想, 由其地理观念而引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反映在它关于“导山”、“导水”的记述之中。关于“导山”, 它写道:

导岍及岐, 至于荆山, 逾于河; 壶口、雷首至于太岳;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入于海。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导蟠冢, 至于荆山; 内方, 至于大别。岷山之阳, 至于衡山, 过九江, 至于敷浅原。

这里所说的一系列的“导山”, 都同治水有关系, 这与传说中的大禹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有必然的联系。再看“导水”, 它写道:

导弱水, 至于合黎, 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 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

导河、积石, 至于龙门; 南至于华阴, 东至于底柱, 又东至于孟津, 东过洛汭, 至于大伾; 北过降水, 至于大陆; 又北, 播为九河, 同为逆河, 入于海。

蟠冢导漾, 东流为汉, 又东, 为沧浪之水, 过三澨, 至于大别, 南入于江。东, 汇泽为彭蠡, 东, 为北江, 入于海。

岷山导江, 东别为沱, 又东至于澧; 过九江, 至于东陵, 东迤北, 会于汇; 东为不江, 入于海。

导沅水, 东流为济, 入于河, 溢为滎; 东出于陶丘北, 又东至于菏, 又东北, 会于汶, 又北, 东入于海。

导淮自桐柏, 东会于泗、沂, 东入于海。

导渭自鸟鼠同穴, 东会于沣, 又东会于泾, 又东过漆沮, 入于河。主导洛自熊耳, 东北, 会于涧、瀍; 又

东, 会于伊, 又东北, 入于河。

由上可知, 起首两条所述“导水”, 一入于流沙, 一入于南海; 末两条所述“导水”, 均入于黄河; 其余各条“导水”, 皆入于大海。这些, 也都与相传大禹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有必然的联系。把“导山”和“导水”所记结合起来, 可以认为: 第一,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先民治水的经验及其成效; 第二, 它大致反映了“九州”之内山川形胜的面貌和走向。人与自然的在这二者的结合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禹贡》的思想还反映在全国范围的行政管理以及有关制度和以德行政的要求。这就是:

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 九山刊旅, 九川涤源, 九泽既陂, 四海会同。六府孔修, 庶土交正, 底慎财赋, 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 祇台德先, 不距朕行。

如此看来, 《禹贡》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专文, 其地理观念并不限于地理本身, 而是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同国家权力与行政管理相联系, 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对后来的地理观念, 尤其是对人们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思想的发展, 都有深远的影响。

## 二、邹衍的“大小九州”说

战国时期稍晚于孟子的思想家邹衍(亦作驸衍)提出了“大九州”的理论。司马迁记其学术思想要旨是:

驸衍睹有国者益淫侈, 不能尚德, 若《大雅》整之于身, 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 必先验小物, 推而大之, 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 学者所共术, 大并世盛衰, 因载其襍祥度制, 推而远之, 至天地未生, 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 通谷禽兽, 水土所殖, 物类所珍, 因而推之, 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德转移, 治各有宜, 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从这一简要的概括中, 大致可知邹衍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尚德”; 其自然观是“先验小物, 推而大之, 至于无垠”; 其历史观是“五德转移, 治各有宜”。

邹衍是齐人, 故其“重于齐”, 同时又受到魏、赵、燕等诸侯国的礼遇, 与孔子“菜色陈、蔡”, 孟子“困于齐、梁”形成极大的反差。但因邹衍主张“仁义节俭”, “王公大人”不能行之, 故其学术思想在社会实践中并无太大影响。

邹衍有论著百余篇,<sup>①</sup>均已佚, 其关于“大九州”的理论之遗文, 主要见于《史记》司马迁述其要点是: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 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 禹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

① 《汉书》卷三十四《艺文志》阴阳家类记: “《邹子》四十九篇。名衍, 齐人, 为燕昭王师, 居稷下, 号‘谈天衍’。”又记: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

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天地之间有小九州与大九州,中国名为“赤县神州”,是小九州之一,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而“禹之序九州”不当称为“州”。人们乃称其为“大小九州”说。

司马迁批评邹衍的思想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又说“驳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这都表明邹衍所论,在当时及后世,都被视为怪异。因为在当时看来,《禹贡》所述“九州”,可谓大矣;而在邹衍看来,这只是天地之间的八十一分之一,这是当时的人(包括邹衍本人在内)都不可能有的充分的根据作出说明的。如此说来,可以认为,邹衍的确是出于某种想象力而描绘了这样一幅“大小九州”的朦胧画面。当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邹衍同“儒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与“天下”不是一个概念:“天下”有大小九州,而中国即“赤县神州”不过是小九州之一,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这一地理观念,不论其是否具有自觉的认识,还是自觉认识达到何种程度,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肯定的。

### 三、《山海经》的地理观念

如果说邹衍的“大小九州”说的地理观念的一大特点,是“中国”即其所称“赤县神州”是“天下”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山海经》在这方面则提出更加“奇特”的说法,反映出了更加丰富的想象力。

《山海经》一书,非一人所作,亦非成书于一时。通常认为,它是战国时的著作<sup>[2]</sup>。论者认为此书的性质是“史地之权舆”、“神话之渊府”<sup>[3]1</sup>,可谓概括了它的主要内容。西汉刘秀(歆)《上山海经表》认为,“《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并把它同禹、益联系起来,“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至,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其事质明有信”<sup>[3]477</sup>。刘秀所论,显然有过分夸大之处。但其所论反映了两汉时一些人对《山海经》一书的重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从地理观念来看,时人认为《山海经》同大禹治水有直接关联,所谓“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显然是受到《禹贡》中关于“导山”、“导水”记载的影响。所谓“由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则是概括了《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范围。所谓“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同邹衍所论“中国”为“天下”小九州之一,在理念上亦有相通之处。总之,刘秀的这些看法,从一个方面概括了《山海经》的地理观念。

《山海经》的内容和结构,今传本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山经”五篇,二是“海经”八篇,三是“大荒经”及“海内经”五篇。刘秀上书表称“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与上述篇数相合。且表文中有“五方之山”、“八方之海”语,又有“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等语,亦与十八篇暗合。《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刑法家类》),疑其未将“大荒经”及“海内经”计入其中。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山海经》为一十八篇(《旧唐书·经籍志上·地理类》),显然是将“大荒经”及“海内经”计入在内,故出现《汉志》与《旧唐志》著录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大荒经”及“海内经”由来及其性质的问题,有人说是刘秀述作,有人说是刘秀之后人们述作,有人说是原系旧文而未加整理者等等<sup>[3]337-338</sup>。

由于《山海经》内容丰富而驳杂,所记涉及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帝王世系、历史人物、奇禽异兽、神话、传说等,故不同的研究者各有不同的关注方面。神话研究者认为:“《山海经》共十八卷,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两大类,其中《海经》部分最有价值。”<sup>[3]1</sup>而对于史地研究者来说,所关注的侧重点显然就不一样了。白寿彝先生对《山经》的论述,简要而精辟,现移用于此,以明其特点:

“五藏山经”是全书中写得最有条理的部分。南山经和北山经都各包含三个分篇,西山经、东山经都各有四个分篇,中山经有十二个分篇。五篇合计,共有二十六六个分篇。每一个分篇记载了一系列的山,记了山的名称、方位、有关的道里和物产,物产中包含了矿藏、草木、鸟兽、虫鱼。有水道者,记其水道。有药材者,记其药材及可治疗的病症。如山经开卷所记: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𪔐𪔐,食之善走。丽(鹿旨)之出水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栎木,多白猿,多玉石,多黄金。

山经所记各山,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体例写的,而分别有所详略。在每一分篇之末,有一小结,记山及道里之数,并记所在之神和应有的祀典,如南山经第一分篇的小结是:

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瘞,糝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山经五篇,又各有结语。山经的最后有总的结语,是这样说的: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

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铍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像“五藏山经”在体例上的条理整齐，在先秦撰述中是仅见的。书中所记山水的可考者，依近年学者的研究<sup>[4]</sup>，多可指出其方位所在，足以证明记载是井然有序的。可以说，“五藏山经”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而又有系统内容的地理书。从五藏山经在史学发展的意义上看，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五藏山经”所记载的地理范围，很为辽阔，突破了诸侯王国的行政区划，扩大了地域的视野。第二，“五藏山经”普遍注意了各地的物力资源，并在最后的结语中，着重指出了出水之山和受水之地的幅员，指出了铜铁对于制作农具、兵器和手工业工具的重要性，最后还说“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体现。尽管“五藏山经”有浓厚的神怪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书中的进步因素的同时存在。司马迁是读过《山海经》的（《史记·大宛列传》）。在对物力资源的重视上，司马迁可能是受到五藏山经的影响的<sup>[5] 161-162</sup>。

“五藏山经”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的总称。从白寿彝先生的征引和分析来看，它的地理观念明确而有序。尤其是它的两个特点，在古代地理观念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海经》的其余部分即《海经》和《大荒经》与《海内经》，其地理观念则远不如《山经》明确、具体。“《海外南经》以下八篇，记海内外各国，略记其方位而没有道里之数；多记怪异，也有一些传说和神话。各条记载之间，凌杂不相连属。材料来源，显然跟五藏山经不同，似主要得之传闻。简策当有脱遗错倒。《大荒东经》以下五篇，所记主题，有山，有丘，有国，有渊，有人，有神物，记述更无伦次，基本上连方位也没有了，传说和神话也更多一些”<sup>[5] 163</sup>。总之，从地理观念来看，《山海经》中的《山经》

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早期地理观念，当不限于《禹贡》“九州”说、邹衍“大小九州”说以及《山海经》的有关记述，但它们都是早期地理观念的突出反映。从这些早期地理观念的反映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

第一，中国历史上早期地理观念源于传说时代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尤其同大禹治水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中国历史上早期地理观念形成于早期国家的产生，《禹贡》“九州”说和国家行政区划及贡赋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中国历史上早期地理观念在视野上存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不论是邹衍所论“中国”与“天下”的关系，亦即所谓“赤县神州”与“天地之际”的九州的关系，还是《山海经》所反映的“四海之外，绝域之国”，都表明至晚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在“中国”之外，还存在广袤的地理空间和“殊类之人”的活动。

第四，中国历史上早期地理观念，不论是以行政区划为主线，还是以“山”、“海”为主线，都反映出地理环境与人及社会的密切结合，尤其重视有关先民生产、生活资源的记载，这对后来地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世舜. 尚书译注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45

[2]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第 1 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238

[3] 袁珂. 山海经校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4] 谭其骧. 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 [Q] / 中华文史论丛: 第七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5]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第 1 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天命”思想早期变化的特点

张子侠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合肥 230039)

在中国古代，天命观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是或

收稿日期：2008-04-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之一（01JAZJD770005）

作者简介：张子侠（1960-），男，安徽砀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者说更是一个历史学的论题。因为先秦时期的史官既司天又司人，“究天人之际”是史家的首要职责。《礼记·表记》曾对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作了高度概括，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有关“夏道”的具体情况，因为文献不足征，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殷周之际，由于朝代的更替的确引起了周人天命思想的一系列